

中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比较与思考

蔡艳芳

(上海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在任何国家都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 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价值理性和价值共识, 促进社会和谐。中美两国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本质属性、内容、方法、途径等方面有异有同, 比较研究有助于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成效。目前国内仍有部分核心价值观教育比较研究偏向于肯定甚至主张照搬美国的价值观教育模式, 忽视了近年来中国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各个方面与时俱进的变化与特色; 比较研究过程中首先应当保持绝对客观和适度自信, 毕竟美国只是开展教育比较研究所需要的典型之一, 而不是绝对的典范。

关键词: 价值认同; 文化认同; 核心价值观; 大学生价值观教育

中图分类号: G 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6)03-0286-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6.03.017

Contrast in Core Value Education of China-U. S. Universities

Cai Yanfang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value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is considered as the top priority for citizen education in every country, and its purpose is to cultivate a common sense of values among the citizens. China and the US have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 and they both have some distinct objectives, contents and methods for core value education.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contrastive study will contribute to core valu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of China because only whe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both systems are better understood, the core value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could be promoted.

Keywords: value identification; culture identification; core values; value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大学生的价值结构应当有三个层面: 一是个人层面的价值理性; 二是国家和民族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认同; 三是全球视野下, 在反思人类多元文化现象与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价值共识。由此可见, 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培育应兼顾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 既要充分体现个人的主体性、价值理性和个性, 又要引导大学生在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上达成

共识, 激励个体“积极参与国家的文化理想和价值共识的建设, 为社会的凝聚与和谐作出贡献”^[1]。中国与美国虽然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差异显著, 但两国同样作为多元文化大国, 都面临着多元价值观对核心价值观的消解和冲击问题。两国都曾因消极价值观蔓延而引发严重社会问题。譬如 60 年代美国因价值虚无主义和极端个人

收稿日期: 2015-08-11

作者简介: 蔡艳芳 (1985-), 女,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E-mail: cai@live.it

主义引发的青少年堕落现象，以及90年代中国出现的个人享乐主义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等等。在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如何兼顾个体的多元化要求和社会的整体性要求这一问题上，中美两国可以在相互借鉴中反思和进步。

一、价值认同与核心价值观教育

（一）价值认同理论

随着全球化激发多元价值观碰撞，价值认同理论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分别在各自视阈下对价值认同的内在规律、实现路径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指“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或者团体的价值规范……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2]。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价值认同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3]。我国学界一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认为价值认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共同的价值观作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动，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并自觉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4]。美国社群主义公民教育学者则提出，社会的基础无疑是“公共的善”（common good），应当重视个体的价值认同、公民参与和德行养成。由此可见，中美两国的价值观教育学界基本都主张从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个层面开展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实现价值认同。

（二）价值认同与核心价值观教育

价值观教育不仅要从学术角度引导个体了解和反思各种价值观，培养其价值理性，更应联合学校、家庭、社会力量，引导个体参与到文化意义和价值共识的建构和实践过程之中，培养其核心价值观认同和社会责任意识。在此意义上，多元文化氛围和核心价值体系“是价值观教育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就像鸟的两翼，缺一不可，不可偏废”^[1]。中美两国的学校和社会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相同的：如何把握多元与核心、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

中美两国在各自的历史进程中都曾因社会核心价值观而出现社会问题——美国的问题在于社会内部价值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引发堕落和混乱；

而中国的问题在于以往灌输式核心价值观教育“证明的过程”有余而“理性的过程”以及实践过程不足，导致学生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情感不能有效地转化为行动。两国完全可以通过相互借鉴从而避免走向两个极端。经过多年实践，美国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尽管其性质、内容、途径等诸多方面与我国有本质上的不同，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我们考察研究美国，并不是为了完全照搬它所建立的各种具体制度，而是为了有选择性地学习那些适用于我们的东西。”^[5]

二、中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比较

（一）中美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念源泉及发展历程比较

中国和美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分别体现了两国不同的价值理想，代表着各自的内在精神和品格，理念源泉和发展历程也各有不同。中国历来重视通过对个体的“教化”，以达成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上的一致，促进社会和谐。美国文化则侧重于理性的“启蒙”，鼓励个体的个性、创造性与自主性。在此社会文化基础上，中国的大学普遍保持着一种民族文化自觉和社会教化责任意识；美国则更注重大学理性启蒙的功能，而非传承道德与文化传统。两国相异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理念分别可以追溯到孔子和苏格拉底。

孔子主张社会治理者和教育者对人民施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礼教化，确立了以“仁”为最高标准的道德范畴体系。孟子继承并发扬孔子的思想，提出应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汉朝董仲舒则进一步指出：“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举贤良对策一》）^[6]儒家的道德“教化”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源泉。近现代以来，我国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体现了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从孔孟思想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梦”的提出，既一脉相

承,又与时俱进。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源泉和文化土壤,中国大学乃至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特色就在于以一种核心价值观来规范和引导多元的文化与价值观,从而确保“一”与“多”的和谐统一。

美国大学教育理念主要源自古希腊,苏格拉底的“产婆式”教育方法正是美国大学价值观教育的原型和典范——通过“理性”层面的平等对话帮助学生发现其“本有的知识”。在此意义上,美国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并非培养一种具体的信仰或者价值共识,而是持“价值无涉”的立场培养“批判精神或理性的怀疑主义”,这显然具有“对知识和价值体系的‘解构’作用”。然而“解构”的滥用和变质一度造成“价值的废墟和荒漠化”^[1]。有美国学者批评道,美国大学不仅没有负起规范个体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责任,有时甚至成了一种反社会的存在^[7]。这也正是美国在20世纪中期滑入价值相对主义泥潭时终于清醒意识到并逐步改善的一个方面。

美国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殖民地时期至19世纪末的古典宗教道德教育;第二,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公民品格教育,主要包括法律教育、个人道德品质教育、权利教育等内容;第三,20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公民道德和价值共识教育^[8]。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了二战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特殊时期。大行其道的多元文化主义向美国的主流文化和“美国信念”发起挑战,社会意识形态面临被颠覆的危险。美国社会开始重视培养大学生价值共识和文化认同。社群主义公民教育思想正是20世纪80年代在批判极端个人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对美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今美国大学生广泛参与的核心价值观实践活动——“服务学习”,以及“品格教育”的复兴无不是受社群主义公民教育思想的影响。

(二) 中美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比较

1. 学校教育

中美两国在学校层面开展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大致都是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两个方面进行。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教育实行的是地方分权制而不是国家统筹制,因此高校没有统一的核心价

值观教育大纲和教材,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成效。尽管仍有一些声音坚持教育应保持“价值无涉”,但由于历史教训的代价沉重,美国加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趋势不可阻挡——一方面大学在历史、地理、文化、道德等通识课程中渗透核心价值观教育,并在各种专业课程中加入伦理和社会责任的视角;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参与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将价值认知、价值情感和价值行为的培养目标贯穿其中,培养学生的公民素质和价值共识^[9]。

在中国,高校则是在国家统筹下开设价值观教育的专门课程,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其核心价值观教育目标是“完成特定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取向上的塑造”^[1]。近年来,由于意识到了传统灌输型价值观教育方式“证明有余而理性不足”的弊病最终将反过来“削弱社会的文化理想与价值共识的基础”^[1],中国的大学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价值理性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和评价方式正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封闭走向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家校合作在国内中小学阶段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受到较高的重视,而到大学阶段,家校之间往往疏于就学生价值观念与行为的现状和教育策略保持常态化沟通。在家校合作机制的探索上,美国的经验相当值得研究和借鉴。早在1998年,美国家长教师协会(National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就颁布了“家长/家庭参与项目的国家标准”^[10];在此基础上,教育专家和各级学校从多个维度着手开展家校合作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主要包括:建立家校沟通机制;亲职教育(即学校和社会帮助家长提升其教育水平);家长担任学校义工、参与校政决策等^[11]。由于受地域条件、学生数量庞大等各种因素限制,国内高等院校可以首先尝试微信/微博家校联络平台等可行性较高的方式凝聚教育合力,逐步探索科学有效的核心价值观家校合作培育模式。

2. 社会教育

中国和美国都非常注重通过社会教育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感和价值共识。根据引导主体的不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又可大致分为政府专门主导的爱国情操培养活动、核心价值观实践活动以及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影响。

两国政府在爱国主义教育场馆建设、国家重大

历史文化活动等方面的投入均起到了良好的育人效果。中国高校学生的“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与城市社区合作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区宣讲和公益服务活动，以及美国强调大学与社区协作的“服务学习”都是属于政府引导下的核心价值观实践活动。值得借鉴的是，美国大学生的“服务学习”活动拥有完备的指导和评价体系，它要求每一个学生在假期进行社区服务或者项目调研性质的“学习旅行”，主题可涉及可持续发展、教育、环保、公益、社会安全等等。中国的高校应当进一步拓宽核心价值观实践活动的渠道和覆盖面，制定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让每一个大学生都有机会、有动力参与到价值实践、社会服务当中。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一国的“软实力”集中体现为“该国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制度政策等因素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和对外产生的吸引力、渗透力……”^[12]。中美两国为了提升各自文化的吸引力、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在大众文化层面均做了大量研究和实践。美国在大众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功能研究和实践上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在其国内，“美国梦”和“美国价值观”通过好莱坞影视作品以及社会各类人物/事件评选等体现出超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于培养大学生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情感和信仰功不可没。对其国外，美国大众文化的价值观辐射、渗透功能则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政府和文化产业合力推动下，美国不断扩大文化影视作品、高科技产品的输出，通过其中蕴含的创新、个性、自由等“美国精神”的吸引力积累外交上的“软资源”。

在中国，“中国梦”的提出正契合了亿万个人和家庭追求幸福生活的朴素理想和“中华大家族”实现复兴的伟大梦想。这一包容了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的梦想在全社会凝聚形成共筑梦想的强大合力。在传媒方面，《舌尖上的中国》唤起了大学生平凡却深刻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共鸣，更通过引人入胜的中华饮食文化向全球呈现出我们勤劳智慧的民族品格和繁盛和谐的国家形象。无论是作为中国国家公关名片在国际平台上投放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还是社会传媒机构致力于宣传中国国计民生新风貌的文艺作品（如“复兴之路工作室”推出的《十三五之歌》等），无不展现出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独特的吸引力。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爱国主义和宗教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使全体公民持久地奔

向同一个目标的东西。”^{[5][13]}宗教在美国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虽然1947年美国最高法院即明令禁止公立学校开设宗教课程，但是家庭、学校、社会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宗教活动仍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具有较大影响。宗教对大学生信仰和价值观的塑造不仅仅局限于教育他们对“上帝”虔诚，更多的是向他们灌输一个信念——“美国精神就是上帝的意志”，强化他们作为美国人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美国社会文化所独有的“公民宗教”范畴。“公民宗教”是美国“宗教和政治特定关系的产物”，它是美国政府在宗教传统之上抽象出来的一整套期望得到公民认同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其实质是“对美国社会发展历程和国家体制的崇拜……是一种凝聚美国多元文化的民族精神”^[13]。“宗教政治”固不可取，但是在多元社会中求同存异，将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所持的文化理想和价值共识整合成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并上升为国家精神的做法值得思考和借鉴。

三、反观美国核心价值观教育内部矛盾的几点思考

中美两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改革与进步，正是得益于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借鉴。不可否认，美国的积极经验仍将继续影响我国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但同时也应当对其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在矛盾保持反思和审慎的态度。

（一）美国传统价值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在矛盾

美国的大学校园文化具有极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内在矛盾也日益激烈。这些矛盾具体表现在：一是患有社交障碍、心理疾病的学生日趋增多；二是校园暴力事件、滥用毒品药品的人数呈增加态势。在倡导自由、独立的“美国精神”影响下，一部分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追求着绝对的自由和理想化，通过吸食毒品等行为来彰显所谓的“个性”或者藉以排解高失业率、不公正等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失望和压力^[14]。美国应对此类问题的社会成本大幅增加。有学者指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传统价值文化与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在矛盾——以美国大学校园的“枪支文化”为例，一方面年满18周岁的大学生依法拥有持枪自由，并且

枪支文化牵涉到的利益关系复杂;另一方面这种“自由”显然与核心价值观教育追求和谐稳定的社会目标相矛盾,并且在现实当中造成混乱和悲剧。当然,如何评判当代美国大学生的道德水平和精神面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当关注的是其文化内在矛盾和负面价值观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成效的影响,并以此为鉴。

(二) 美国政府自身伦理建设对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消极影响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要实现民众的认可与践行,首先需要其倡导者——政府通过实际行动加强自身伦理建设。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有一些积极行动值得借鉴,比如控制政府消费、鼓励社会力量监督等等,但是它的一些不当作为严重消解了公民对其一贯倡导的核心价值的认同。例如,201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职员斯诺登所曝光的“棱镜”项目完全撕开了美国“言论自由”的真实面目。另外,据《今日美国》披露^[15],自联邦最高法院2010年的裁决开启了政治捐款的闸门之后,金钱对美国政治的操纵程度不断加深。有学者批评道,美国的民主程序实际上早已被金钱“绑架”,利益集团只需先捐款,然后便可坐等回馈。对于深受“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影响的美国大学生而言,一朝目睹某些现实与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完全相悖,其价值观所受到的严重冲击可以想见。

切实维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提高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有利于形成文明开化的社会环境,从根本上实现民主。反观美国的“棱镜计划”和“金钱政治”,其政府所言与所为的悖谬受到国内外公众的批评反对。另外,这也说明我国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伦理建设、维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性。

(三) 美国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与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矛盾

早在1946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提出,美国要通过文化和价值观的推广和渗透,让其他国家人民接受美国对世界的基本价值立场,他说:“……要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能够像控制我们48个州的形势那样控制世界的形势。”时至今日,虽然美国通过文化价值观渗透“控制世界”的目的没能达成,但是它从未停止以推广“普世价值”的名义扩张自身利益。与此同时,由美国政府出资

的教育、文化交流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第四维”,目的是广泛影响进而同化各国社会精英阶层,从而推进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普世进程”,这被称为“对美国国家长远利益投资的一个典范”。2013年仅中国一个国家受邀或者获准赴美学习的人数就多达197 195人,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从长远看,只有当美国摆脱了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对他国文化和价值观保持开放包容、虚怀若谷的态度,与其核心价值观教育倡导平等自由的精神保持一致,各国共同发展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 [1] 杨柳新. 大学的价值观教育与文化认同[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8, 6(4): 107-124.
- [2] 邱钰斌. 价值认同理论考察及核心价值观教育启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11): 235-237.
- [3]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王力,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1: 42.
- [4] 贾英健. 认同的哲学意蕴与价值认同的本质[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51(1): 10-16.
- [5]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M]. 张晓明, 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2.
- [6] 金春峰. 汉代思想史[M]. 第三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334.
- [7] Watson B C S. Civic Education and Culture [M]. Wilmington: ISIbooks, 2002: 157.
- [8] 周文华. 美国核心价值观建设及启示[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112-113.
- [9] Swaner L E. Educating for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Liberal Education, 2005, 91(3): 14-21.
- [10] National PTA. National standards for parent/family involvement programs [S]. Chicago: National PTA, 1998.
- [11] 杨雄, 刘程. 家校合作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发展[J]. 思想理论教育, 2012(11): 7-11.
- [12] 约瑟夫·奈. 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 吴晓辉, 钱程,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11.
- [13] 聂迎娉, 傅安洲. 论美国公民宗教的内涵[J]. 理论月刊, 2011(5): 152-154.
- [14] Putnam R D.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2015: 105-110.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4年美国的人权纪录[EB/OL]. (2015-06-26)[2015-07-20]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626/c1002-27213089.html>.

(编辑: 巩红晓)